## 美国汉学家葛维汉：

#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探寻者



葛维汉（1884—1962年）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博物学家。1913年葛维汉抵达四川，在四川生活和工作长达35年，直到1948年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退休返美。在此期间，葛维汉对四川历史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相关学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显著成就。葛维汉一生为发掘、记录、保护、传播和阐释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内外学者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开启三星堆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葛维汉曾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并凭借《四川省的宗教》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为葛维汉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中国文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2年，葛维汉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并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这为他专注于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支持。1934年，葛维汉运用他所学的知识，带领华西协合大学考古队对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引起了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三星堆遗址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古蜀世界，而葛维汉主导的发掘工作对于理解古蜀文明发展、揭示其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发现和研究中国灿烂的文化提供了宝贵材料。同时，葛维汉在发掘工作中采用了现代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早期历史进行了新的阐释。葛维汉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一方面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的序幕，促进了四川考古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学者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更为科学的态度探究和解释中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承载的璀璨文化能够呈现于世人面前，葛维汉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此外，在考古学领域，葛维汉也是最早对四川僰人悬棺进行研究的学者。从1932年到1936年，葛维汉多次穿梭于川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进行大量的实地勘探和田野调查，并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三篇关于僰人悬棺的文章：《四川古代的白（僰）人墓葬》《川南的白（僰）人墓葬》《有关白（僰）人的历史文献》。在这三篇文章中，葛维汉对悬棺的材质、摆放位置、形状等做了详细的记录与描述，对僰人族源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他的研究向世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僰人悬棺的窗口，也为后人研究僰人悬棺提供了参考。

探寻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魅力。作为文化人类学家，葛维汉的主要成就集中于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研究。他曾多次赴川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博物学搜集和人类学考察，收集了大量关于羌族、苗族、藏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日用品和手工制品。葛维汉对这些民族文物进行了系统描述、分类与整理，并将其制作成具有研究价值的标本。在每一次实地调查过程中，葛维汉都会拍摄大量照片，并通过笔记详细描写和记录当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包括这些民族的历史、习俗、宗教、民歌、传说、语言和生活环境等。这些丰富的民族学调查材料包括民族文物、图片和文字资料，弥足珍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四川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葛维汉不仅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记录与保护，而且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葛维汉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完成了《打箭炉之行》《藏族宗教仪式和节日的笔记》《羌族的习俗与宗教》等研究成果。其中，羌族是葛维汉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对羌族的族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早开始羌族研究的外国学者是英国人陶然士，他提出羌族是古以色列人后裔的观点。葛维汉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羌族是中国的土著民族而绝非外来人种，并从羌族的体质特征、习俗、宗教等方面加以论证，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

1948年，葛维汉退休返回美国后，依然没有间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根据之前在中国工作时搜集到的详细资料，葛维汉完成了四本著作，即《川苗的歌谣和故事》、《羌民的习俗和宗教》、《中国西南的民族宗教》、《更多川苗的歌谣和故事》（完稿未出版）。在他的著作中，葛维汉将西南地区看作一个整体，客观地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间的交融与互动。他敏锐地指出，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西南各民族在宗教和习俗上相互影响，使他们的文化不仅保留了自己的独特之处，也呈现出与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相融合的特点。

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葛维汉在四川生活与工作的35年间，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大量搜集而来的神话、歌曲、经文翻译成英文，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民俗器物，这些都成为当时西方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元素，也是中美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象征。

葛维汉的搜集与保护工作还对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博物馆作为陈列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博物学的场所，以科学的视野将文物搜集与学科研究相结合，并通过举办展览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公众教育方面的作用。这些努力使得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馆藏日益丰富，1936年该馆馆藏文物就达到15885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1944年，为了纪念葛维汉长期以来为博物馆作出的奉献，特将图书室命名为“葛维汉图书馆”。

经过百年沉淀，目前图书馆馆藏资料涉及民国以来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的珍贵资料，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平台。

冯钰伟 据《学习时报》

# 卢戇章：汉语拼音的领路人



现如今，汉语拼音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学习汉字、学习汉语的工具。但是万万想不到，在中国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中，有一位连普通话都不标准的闽南人，他就是卢戇章先生。

1854年12月，卢戇章出生于福建同安县古庄乡。他自幼聪颖，9岁入学，18岁参加科举，县考名列前茅，府试却落第，从此不入科场。卢戇章在邻村英埭头执教时，恰逢“西学东渐”，受西方文化影响尤深，故与科举制度进一步决裂。他说：“求学期于济世，寻章摘句胡为哉？”

1874年，卢戇章南渡新加坡半工半读，专攻英文。1879年回厦门后，寓居鼓浪屿内厝澳。因他既会厦门话，又懂英文，所以“西人习厦话，华人习英文，均奉以为师”。在鼓浪屿，他应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的聘请，帮助翻译《华英字典》。彼时，外侮内患，国难当头，这激发了正直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卢戇章注意到4亿中国人80%以上是文盲，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离，平民读书识字困难重重的现实。于是，他更坚定音字改革的决心，益发猛进不懈。为了实现改革汉字的宏愿，他致力于研究漳泉十五音和话音字，于1892年写成了厦门话的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书中拟订了他称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提出了“语言一律”的思想。

《一目了然初阶》出版后，卢戇章在鼓浪屿乌埭角和厦门二十四崎脚召集船工、小贩开班教学。他为了鼓励大家习识，还通过考试给予奖赏。实践证明，学习这种切音字，只需半年时间就能简单写作。一时十分风行，连外国人来学的也不少，都称赞简便易学。由于他热心推行，“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之”。事实上，卢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创造性地采用了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卢戇章的大胆尝试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广泛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98年，时在工部虞衡司任职的安溪人林辂存上书，请求将卢戇章的字学新书颁行天下。光绪皇帝饮批“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取卢戇章等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奏”，但因戊戌政变被耽搁。1905年，卢戇章把经过修订重写的《中国切音新字》专程送到北京，请求推行。但学部与外务部互相推诿，最后译学馆的文典处审查后，拟了一通3000多字的长批，称：“该书疏谬略有数端，自难用为定本通行各省”，就给驳回了。

这次打击，让卢戇章明白恳求朝廷推行的路行不通，于是他改变策略，努力向社会宣传。回厦途经上海时，卢戇章再次修订内容，以《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的书名出版，并制订官话、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等6种切音字方案。1913年，全国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卢戇章被委派为福建省的会员，年过六旬的他，仍不辞辛苦参会。回厦门后，卢戇章又先后出版了《中国新字》《中华新字》二书。1920年，读音统一会会长吴稚晖写信向主漳的陈炯明推荐卢戇章说：“闽南欲作文化运动，不可无此君耳！”于是，卢戇章应陈炯明的聘请，到漳州教授注音字母。回到鼓浪屿后，虽已年迈，但卢戇章仍每天教一大批人学切音字，“有从而问学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之”，把他倡导的汉字拼音，付诸实践。后来，林辂存曾题赠一联，印在《北京切音教科书》的封面：“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

1928年12月28日，卢戇章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享年75岁。

梁水源 据《人民政协报》